承前继往 开拓前进

——武汉大学历史系“建国40年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讨论会”纪要

冻国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而辉煌的前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历史学这门古老的传统学科获得了蓬勃生机,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潮,不仅超越了具有优良传统和丰厚成果的古史学,而且也大大发展了五四运动至建国以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与初步发展时期的史学。在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历史科学取得了与时代相映益辉的丰硕成果。回顾40年来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轨迹,登高望远,深刻反思,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激励斗志、增强信念、端正学风、扬长避短、放眼未来,推动中国历史科学事业的继续前进,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此,在国庆前夕,武大历史系组织下辖各室、所分别举行了“建国40年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讨论会”,老、中、青史学工作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结合本系实际,多层面、多方位地对中国历史学不平凡的40年历史进行了认真而深刻的回顾,高度评价了40年来中国历史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尚存在的问题,并对历史学未来的展望提出了可行的建议和构想。现将这次讨论会所集中讨论的问题主要以本系的实例为中心加以概括综述如下。

与整个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相同步,武大历史系建国40年的历史学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一批老一辈史学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已逐步学习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建国以后,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辛勤耕耘,不断推出新的成果。与此同时,本系的新一代史学工作者陆续成长、壮大,他们和老一辈史学家一道相继参加了自50年代开始的对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并在教学和科研实践中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素养和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这批新一代史学工作者已成为当今武大历史系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据初步统计,自1949年至1966年,本系史学工作者共出版各类学术性著作26部之多,发表论文近80篇,科研成果蔚为可观。第二个阶段是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时期,这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停滞时期,本系正规的史学研究也基本中断,但是仍有部分史学工作者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科研工作,尽可能地积累资料,从事笔耕。第三个阶段是1976年至1989年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1年间,中国历史学重新步入了科学发展的轨道,武大历史系也开始了它的繁荣时期。由于历史科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使广大史学工作者挣脱了“左”的锁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学术界得以在良好的政治环境里“上下求索”;同时又由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为史学工作者开阔视野乃至开展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时代氛围之下,老一辈史学家“壮心不已”,青春焕发,中年学者承上启下、肩负重任、奋力拼搏,青年学者积极进取、脱颖而出,梯队整齐、实力雄厚、充满活力的老中青教学科研队伍逐步形成并不断壮大。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武大历史系便迅速恢复了“文革”中陷于停顿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和“美国史研究室”。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科研队伍的壮大,武大历史系又先后成立了“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荆楚地理研究室”、“中国近百年史研究室”、“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室”和“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报国家教委批准,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和“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分别成立了“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考古专业从无到有,如今也形成了一支科研、教学、田野考古相结合的队伍。从科研方面来看更是硕

累累,从1977年以来,先后出版各类专著、教材、大中型工具书、论文集及史学普及读物近100种,发表论文1000余篇。其中,10余种著作和论文组分别获得湖北省及武汉大学社会科学一、二、三等奖,两部专著获得美国王安汉学研究会基金奖,另有不少论著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重视和好评。同时,史学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具体来说,在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史学研究领域与解放前相比无疑大为扩展,但主要集中在几个比较大的问题上,在研究比重方面,世界史弱于中国史,近现代史又弱于古代史,边缘学科的研究尚未起步,各类专史、部门史的研究相对薄弱,分工也不甚明显,而近10年的情形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部门史、地区史的研究比重加大;二是研究的课题更深更细,如在世界史里面划分出二战史、美国史、英国史,成果显著,充满生机;在中国史方面,荆楚地理、中国水利史、财政史、中国近代史、大革命史、抗战史迅速起步,各自独树一帜;三是敦煌吐鲁番学异军突起,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形成本系的特色之一。在人才的培养上,既重视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又重视业务方面的训练和陶冶,40年来为国家输出了大量的合格人材。有相当一部分已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成为骨干力量,一些业务骨干业已成为新的学术带头人。在中外学术交流方面也有了一定发展,在近10年的时间内先后与日本、美国、德国、南斯拉夫、法国、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有关学术机构、高等院校建立了学术联系,分派多批访问学者、留学生前往深造,同时也接纳了多批来自日本、土耳其、香港等地的访问学者、留学生和进修生,并由本系有关室所发起或组织了全国性的乃至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本系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不断提高和扩大。此外,在史料的整理编纂方面、在资料建设方面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如果说,自建国初至“文革”前的17年是本系一个不断开拓前进的时期,为历史系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话,那么,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余年则是一个大发展时期,它一方面继承了“17年”形成的优良学风,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崭新的面貌取得了较第一个阶段更为辉煌的成果。我们肯定这40年间本系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毫无疑问,在巨大的成就之下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交叉性的需要联合攻关的课题未能很好地协调;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至今尚未涉足或者尚未取得应有的发言权,不少难点悬而未决;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尚嫌不足,史学对两个文明建设所起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与外界的学术联系和交往非常有限,等等。这些问题多数通过史学工作者自身的努力即可达到,若干问题还需有关部门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方能解决。这次讨论会在对过去的40年巡礼和回顾的同时,还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以下几点构想:

第一,应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智慧和优秀思想的结晶。她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指南,也是我们从事一切科学研究的指南,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才能真正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使我们所进行的学术研究获得真正科学的结论。毫无疑问,武大历史系在过去的4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取得的,老一辈史学工作者也大都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和理论水平,并能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但是,对于广大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和一部分中年学者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还远远不够。由于近年以来,在大量的西方史学理论引进的情况下,良莠交杂、鱼目混珠,加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出现了“淡化”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为了提高广大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在科研教学过程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史学领域的影响,对中青年学者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深化教学改革、提高学术水平,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围绕这个问题,首先应当要求全系教师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深刻地领会其精髓,同时,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配备专门的力量充实《史学概论》的教学和研究。

第二,在研究过程中,对于一些交叉性的、跨度大的、承上启下的课题应组织联合攻关,发扬群策群力的精神,打破原有的封闭状态。事实上,人类历史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古今中外原本就是一个整体,断代史研究、区域史研究固然可以将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历史搞深搞透,但如果不上溯其渊源、下探其流变,纵横联系、前后比较,许多问题是难得弄清楚的。而且,从研究的水平和课题的要求而言,局部的个人的力量又往往是难以胜任的,利用群体的优势,上下挂钩、左右结合、取长补短、加强合作,必可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发扬传统优势,加强新课题的研究,进一步开拓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这里有三点思考:(1)从历

会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理想去鼓舞人民，教育人民，以高尚的健康的审美情趣去悦愉群众，诱导群众。

从40年代以来的文艺发展史，包括近几年文艺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清楚地说明了，只有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方针，才能保证革命文艺的健康和繁荣，要摆脱党的领导，要以别的什么思想作指导，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搞自由化、多样化，可能会有别的什么文艺的繁荣，但必不能有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而人民需要的、历史需要的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

上述观点，有的不一定属于精神污染性质的问题。但我以为在理论上都是错误的。有些观点已受到了一定的批评，但有些观点至今不见报刊上有论辩文章。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批评和反批评以及自我批评，澄清是非，是完全必要的。

茂林多枯叶，兰天有乌云。事物的辩证法总是这样。衷心希望文艺界在这次思想清理中，能更多一些自觉性，能更多一些辩证法。可以预见：通过这次清理，文艺界将更加思想活跃，更加心情舒畅，文艺园地将更是繁花似锦，更是百鸟唱春！

1983年根据1980年在一会议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

(本文责任编辑 张炳煊)

(上接封三)

史系总的情况看，中国古代史研究起点较高，力量也较雄厚，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可以说这是历史系的一个特色，这个优势不能丢。但是，在保持和发扬传统优势的前提下，还应加强新课题的研究，特别是应加强现代史和当代史的研究。现代史虽然在近年来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仍有不少问题尚属空白点，有些问题的研究深度与兄弟单位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现代史和当代史与进行国情教育、爱国主义和革命优良传统教育，以及增强对当代世界的了解和与各国人民的交往，更好地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密切相关，特别需要迎头赶上去；(2) 加强湖北地方史的研究。武汉大学地处湖北省中部地区，研究湖北地方史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随着区域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和中央“中部崛起”战略规划的制订，湖北地方史的研究更显得日益重要，而武大历史系又有一批常年从事和热衷于研究地方史的同志，也完全有条件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研究湖北地方史，武大历史系应该最有发言权，也必须获得发言权；(3) 投入更多的力量加强各类专门史、部门史和国别史的研究。区域经济史、城市史、农业史、商业史、灾荒史、家庭史、社会风俗、文化生活 and 国别史的研究相对薄弱，与本系的实力和学术水平相比很不适应，对此应有统一的规划和部署，同时，每位史学工作者也应有比较自觉的认识和行动，不断地学习和充实，努力调整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勇于开拓史学研究新领域。

第四，进一步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发挥历史科学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认真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决议精神，紧密结合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结合本单位的实际，运用各种形式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优良传统、中国国情的教育和中国革命史基本知识的教育，使之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端正史学的提高与普及的关系。史学研究要有深度，这代表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平，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建设和传播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工具，为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史学的社会化、大众化亦即史学的普及也十分必要。因此，处理好提高与普及的关系是今后本系历史教学和科研的一个重要课题。端正态度，提高认识，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有轻视或忽视普及历史知识教育的观念。最近几年来，本系的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工作，如何保持和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也是今后的一大课题。

最后，大家还对如何进一步鼓励和扶植青年学子的成长，如何进一步加强学术信息交流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和设想。大家相信，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经过全系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开创史学研究的新局面，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迎来一个又一个硕果累累的金秋。